

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 与传统治理模式

张 春 瞿 诗 怡

内容提要 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特定阶段，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政治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也不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现象，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要经历政治从不发达向发达状态的转变。非洲国家在赢得独立后，虽然面临内政外交的诸多现实困难和挑战，尤其是面临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横加干预，但是也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努力向政治现代化迈进。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非洲经济社会遭受严重冲击，暴露出非洲国家政治治理不足问题。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非洲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发展道路探索，加快推进政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造福非洲人民。当前，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探索主要有三种表现：以西式民主为参照的政治民主化不断加强；本土传统模式明显回归；大众政治意识高度觉醒。从中长期来看，有效结合政治现代化、本土传统和大众监督的非洲政治发展道路，或许是非洲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非洲政治 政治现代化 民主政治 大众政治 政治治理

作者简介 张春，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昆明 650091）；瞿诗怡，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昆明 650091）。

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特定阶段，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包含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制度化等内容。“政治现代化是每个国家在社会发展中必经的过程，政治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也不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现象。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要经历政治从不发达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这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总是不断向前推

进, 实现人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和解放。”^① 非洲国家在赢得独立后, 虽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横加干预, 但是也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努力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迈进。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 如果以西方开发的政治治理指标衡量, 非洲政治治理水平似乎呈倒退态势。例如“世界治理指数”(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显示, 相比十年前, 2020年的非洲政治治理水平全面下跌, 其中政治稳定下跌12.4%, 管理质量下跌9.3%, 政府效能下跌3.4%, 法治质量下跌2.9%。^② 需要强调的是, 以“科学”面貌展现的西式评估, 可能掩盖了非洲政治发展的多样化态势: 非洲民主“并未终结”。^③ 事实上, 经济困境或发展困难, 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洲国家深入反思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机会。当前非洲政治发展态势既有其历史背景, 也有其经济与社会根源。在西方语境下, 非洲曾被认为是“无望的大陆”。经过几十年艰难探索与发展, 非洲又成为“有希望的大陆”。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 还是人类发展指数, 均显示出“非洲崛起”是21世纪初最重要的国际事态之一。^④ 但是,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非洲经济、社会遭受严重冲击, 医疗卫生体系脆弱和国家治理能力不足问题凸显。仅从减贫角度看, 新冠肺炎疫情使超过4000万非洲人陷于极端贫困。^⑤ 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 非洲国家需要进一步探索自身政治发展道路, 加快推进政治现代化,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造福非洲人民。当前, 非洲政治现代化主要有三种表现: 以西式民主为参照的政治民主化不断加强; 传统治理模式明显回归; 大众政治意识高度觉醒。从中长期来看, 有效结合政治现代化、本土传统和大众监督的非洲政治发展道路, 或许是非洲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

政治民主化不断加强

经济困境与发展困难使非洲民主化进程有所放缓, 但非洲正经历“第三次民主

- ① 孙景珊:《政治现代化: 政治发展的一种存在状态和实践过程》,《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7页。
- ② World Bank,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http://www.govindicators.org> [2022-01-18].
- ③ Nic Cheeseman, “Africa in 2021: The End of Democracy?” *The Africa Report*, December 20, 2021,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158603/africa-in-2021-the-end-of-democracy/> [2022-01-25].
- ④ Ewout Frankema and Marlous Van Waijenburg, “Africa Rising?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frican Affairs*, Vol. 117, No. 469, 2018, pp. 543-568; “Africa Rising,” *The Economist*, December 3, 2011, <https://www.economist.com/node/21541015/print> [2022-02-01].
- ⑤ United Natio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1, pp. 26-27.

衰退浪潮”的判断并非主流认知。^①这不仅是因为如今非洲的民主选举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更是因为就其相对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非洲民主化进程事实上取得了“非凡”进展，甚至可被称为“逆流而上”。^②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政治民主化仍然是非洲政治发展的主流，体现在选举政治、政党政治和法治化等方面。

（一）选举政治持续深化

选举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组成要素之一。随着非洲民主化的推进，选举不仅在国家层面定期举行，还得到非盟《非洲民主、选举和治理宪章》的保障。1989年以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定期举行多党选举。截至200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4个国家举行了首次大选，33个国家举行了两次大选，20个国家举行了三次大选。^③截至2018年，在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长期跟踪的3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有15个国家连续举行了5次大选，10个国家连续举行了6次大选。^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非洲各国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困难，推动选举政治发展。2020年和2021年，非洲分别举行了12场和15场大选。需要说明的是，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索马里等国推迟大选主要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

由于选举政治的普及和深化，民众对选举政治的认知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2005—2018年，在非洲晴雨表调查的34个非洲国家中，民众对选举质量的认知较为积极且整体稳定。2005年，认为选举质量相对较高的民众占受访者总数的66%，2018年略有上升达到68%，而认为选举质量不够高的民众仍有25%（图1）。非洲晴雨表还就最近一次选举是否公开和公正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非洲民众的态度总体稳定。2011—2013年，认为选举完全公开、公正且少有瑕疵的民众达到66%，认为选举存在重大问题且不公开、不公正的比例为25%；2019—2020年，前者增加了2个百分点，而后者下降了2个百分点。^⑤更为深入地考察非洲民众支持选举的动因，可发现两个特别现象：一方面，非洲民众对

① Anna Lührmann and Staffan I. Lindberg, "A Third Wave of Autocratization is Here: What is New about It?" *Democratization*, Vol. 26, No. 7, 2019, pp. 1102 - 1104.

② Nic Cheeseman, *Democracy in Africa: Successes, Failure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 - 4.

③ Lise Rakner and Nicolas Van de Walle, "Opposition Weakness in Af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0, No. 3, 2009, pp. 108 - 110.

④ Michael Bratton and Sadhiska Bhoojedor, "Africans Want Open Elections—Especially if They Bring Change," *Afrobarometer Policy Paper*, No. 58, 2019, pp. 14 - 15.

⑤ Fredline M' Cormack - Hale and Mavis Zupork Dome, "Support for Elections Weakens among Africans; Many See Them as Ineffective in Holding Leaders Accountable," *Afrobarometer Dispatch*, No. 425, 2021, p. 13.

选举质量的判断，与特定国家连续、定期举行选举的次数紧密相关，如果连续且定期举行选举的次数更多，民众、执政党及在野党对选举质量的认知更加积极；另一方面，非洲民众对选举质量的判断，与特定国家的反对党获胜记录及未来获胜可能性紧密相关。换句话说，受西方宣传误导，选举竞争激烈度、在野党获胜可能性等指标，被建构为衡量选举质量特别是选举公开性和公正性的重要标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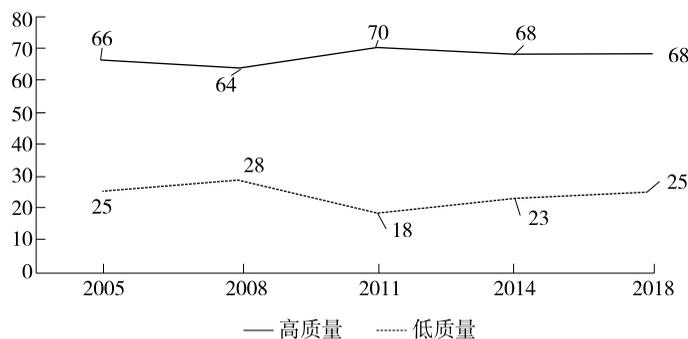


图 1 非洲民众对选举质量的认知变化 (%)，2005—2018 年

资料来源：Michael Bratton and Sadhiska Bhoojedhur, “Africans Want Open Elections—Especially if They Bring Change,” p. 10.

构建选举质量的衡量标准，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干预非洲国家内政的新手段。一方面，西方国家和媒体大加宣扬反对党获胜。2021 年 8 月，反对党领袖哈凯恩德·希奇莱马 (Hakainde Hichilema) 赢得赞比亚总统选举，在任总统埃德加·伦古 (Edgar Lungu) 一度质疑选举结果，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选举结果。西方国家强调，这是赞比亚独立以来第三次实现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权力和平交接。^② 作为对希奇莱马的支持，西方国家褒扬其推行的腐败“零容忍”政策，并将其评为 2021 年度非洲最佳总统之一。^③ 类似的，西方国家也对穆罕默德·巴祖姆 (Mohamed Bazoum) 赢得尼日尔总统选举表示支持。尼日尔平息了大选结果公布后的街头骚乱，实现了政权和平交接。相比之下，佛得

① Michael Bratton and Sadhiska Bhoojedhur, “Africans Want Open Elections—Especially if They Bring Change,” pp. 14 – 15.

② “Zambia’s Opposition Leader Wins Landslide Election as Young People Turnout in Huge Numbers,” CNN, August 16,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8/16/africa/zambia-election-president-hichilema/index.html> [2022 – 03 – 15].

③ Alexander B. Cummings,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Fightback Against Africa’s Economic Slowdown,” *African Exponent*, November 26, 2021, <https://www.africanexponent.com/post/17550-good-governance-and-the-fightback-against-africas-economic-slowdown> [2022 – 03 – 20].

角从未出现过选举暴力，同样是反对党获胜，该国 2021 年总统选举较为“平淡”。在西非经济共同体的监督下，反对派领导人、前总理若泽·马里亚·内韦斯 (Jose Maria Neves) 赢得选举，并顺利宣誓就职。^①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往往对执政党获胜表示质疑，并试图煽动非洲国家内部分裂。在疫情冲击和经济困难的背景下，执政党获胜往往意味着政策稳定和连续，这对非洲国家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西方国家往往动用政府和舆论力量，质疑一些非洲国家的选举结果，对非洲民众产生重大的误导性影响。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提格雷冲突、埃塞俄比亚—苏丹边界争端以及复兴大坝争议等复杂背景下，埃塞俄比亚于 2021 年 6 月举行议会选举，现任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 (Abiy Ahmed Ali) 领导的繁荣党赢得压倒性胜利，并得到非盟选举观察团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次“有序、和平、可信”的选举。^② 但是，企图干涉埃塞俄比亚内政的西方国家对此次选举持消极态度，它们甚至指责阿比“操纵选举”激化了国内冲突。^③ 美国政府强烈批评此次选举，导致大量埃塞俄比亚裔美国人走上华盛顿街头进行抗议。^④ 打着“民主”的旗号，干预非洲国家选举和内政，一直是美西方惯用的伎俩，只是有不同表现形式和手段。

(二) 政党政治日渐巩固

非洲国家独立后，多党政治和竞争性选举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独立之初快速发展，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陷入低潮，冷战结束后再次获得发展动力。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冷战后放弃了一党制或军事专政，实行多党选举制，至少从形式上转向民主政治。

一方面，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各国逐渐放松对政党的限制。民主变量 (Varieties of Democracy) 数据库显示，非洲各国对组建政党的限制持续放宽，禁止政党活动的措施也相应减少，反对党自由度明显提高，政党组织水平或制度化

① “Jose Maria Neves Sworn in as New Cape Verde President,” *Africa News*, November 11, 2021, <https://www.africanews.com/2021/11/09/jose-maria-neves-sworn-in-as-new-cape-verde-president/> [2022-03-15].

② “Ethiopia General Elections ‘Credible’: African Observers,” *Anadolu Agency*, June 23, 2021, <https://www.aa.com.tr/en/africa/ethiopia-general-elections-credible-african-observers/2283323> [2022-03-15].

③ René Lefort, “Abiy’s Botched Centralization Fuels Ethiopia’s Feuding Centrifugal Forces,” *Ethiopia Insight*, April 30, 2022, <https://www.ethiopia-insight.com/2022/04/30/abiys-botched-centralization-fuels-ethiopias-feuding-centrifugal-forces/> [2022-05-08].

④ Catherine E. Shoichet, “Ethiopia’s War is Echoing on the Streets of Washington,” *CNN*, November 9,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11/09/us/ethiopia-conflict-ethiopian-americans/index.html> [2022-05-08].

水平也有所提升。如图 2 所示, 1991 年非洲政党发展指数甚至是负数, 冷战结束后至 2012 年非洲政党发展水平快速提高, 达到 0.8 以上, 此后渐趋稳定, 2019 年后略有回落, 但仍高于 0.75。^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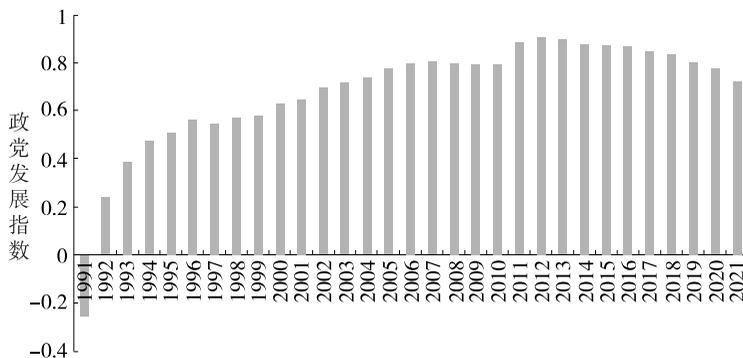


图 2 非洲政党发展水平, 1991—2021 年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民主变量数据库资料制作, <https://www.v-dem.net/>.

另一方面, 非洲政党的跨种族化、全国化和制度化水平显著提升。不仅执政党追求跨种族支持, 反对党也是如此。1990—2012 年, 在所有执行跨种族和全国化竞选策略的非洲国家政党中, 有一半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② 例如, 在种族身份对选民影响较大的尼日利亚, 得到约鲁巴族和伊博族支持的富拉尼族候选人穆罕默杜·布哈里 (Muhammadu Buhari) 赢得 2015 年总统选举。又如, 在民主政治更为成熟的加纳, 选民认为政党比种族更加重要。^③

由于传统上与地理、种族等因素联系密切, 西方国家对非洲多党政治和竞争性选举存在偏见: 其一, 即使多数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努力获得广泛的跨种族支持, 西方国家仍将非洲选举视作另一种“种族人口”统计方式。^④ 其二, 有效政党对民主政治“不可或缺”, 但西方国家却常常强调, 在非洲民主国家特别是新生民主国家中, 政党尤其是反对党的发展往往是民主政治“最薄弱的环节”。^⑤ 政党被认为是不稳定的, 经常出于选举需要而组织并在选举后解散,

① 非洲政党发展指数是关于政党组建障碍、政党禁止、反对党自由度及政党组织水平的综合性衡量指标, 得分区间为 -1 到 1, 得分越高, 政党发展水平越高。

② Leonardo R. Arriola, “Capital and Opposition in Africa: Coalition Building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World Politics*, Vol. 65, No. 2, 2013, pp. 233 - 272.

③ Nahomi Ichino and Noah L. Nathan, “Crossing the Line: Local Ethnic Geography and Voting in Gha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2, 2013, pp. 344 - 361.

④ Donald P.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196.

⑤ Vicky Randall and Lars Svasand,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Africa,” *Democratization*, Vol. 9, No. 3, 2002, p. 32.

这导致政党内部的民主徒有其名。^① 同时，反对党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四分五裂，难以履行对执政党和总统的政治制衡功能。^② 另外，与民主质量的衡量标准相关，政府更替被视为民主质量的“黄金标准”，因而被认为是理想的政治变革。^③ 这种对民主选举的扭曲认知，与非洲各国政党缺乏代表性、竞争性等因素相结合，导致非洲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往往较低，大多数人并不加入任何党派甚至不关心政治，仅有 46% 的民众自称与政党关系密切。^④

（三）政治法治化有所提升

非洲国家大多实行西式三权分立制，强调司法独立性，维护司法权威性，但同时存在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是非洲政治现代化面临的一大挑战。由于国家形成的特殊性，腐败成为困扰非洲国家的重大难题，而司法制度不完善进一步助长了腐败。事实上，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庇护政治、非法资金用于政治竞选、操纵选举、挪用国家资金乃至政治杀戮等现象在非洲国家广泛存在。^⑤ 政治腐败难以根除，某种程度上与非洲国家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相互交叉，司法独立性和权威性差等因素密切相关。

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随着政治现代化不断推进，非洲国家的司法独立性得到有效提升。民主变量数据库显示，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司法独立性缓慢提升，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司法问责度，表现最差的是司法腐败度，最高法院的独立性也得到提升。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肯尼亚最高法院判决该国 2017 年 8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结果无效，并要求于 60 天内重新举行选举，这是冷战结束以来非洲首次由一国最高法院推翻大选结果。有舆论欢呼这是非洲民主法治进步的表现，是民主法治在非洲的光荣胜利，但也有人认为此次裁决给肯尼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但是，无论怎样，肯尼亚最高法院的裁决已经创造了历史，成为非洲政治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⑥

在彰显非洲国家司法独立性和权威性方面，还有一些重要或突出事件。例

① Lise Rakner and Lars Svasand, “In Search for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Political Parties in New Democracies: Malawi and Zambia Compared,” *Democratization*, Vol. 17, No. 6, 2010, p. 1250.

② Lise Rakner and Nicolas Van de Walle, “Opposition Weakness in Africa,” p. 120.

③ Michael Bratton and Sadhiska Bhoojedhur, “Africans Want Open Elections—Especially if They Bring Change,” p. 22.

④ Michael Bratton and Sadhiska Bhoojedhur, “Africans Want Open Elections—Especially if They Bring Change,” p. 17.

⑤ Mark Philp, “Defining Political Corruption,” *Political Studies*, Vol. 45, No. 3, 1997, pp. 436 – 462.

⑥ 殷悦、王磊：《肯尼亚最高法院的“惊天一盼”》，《世界知识》2017 年第 19 期，第 56—57 页。

如，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因“藐视法庭罪”被宪法法院判决入狱 15 个月，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被判入狱的前总统。祖马被控在 2009—2018 年担任南非总统期间谋求私利、窃取国家财政收入。更为严重的是，通过与商人、政客合谋，祖马使南非出现“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现象，颇类似于刚果（金）、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存在的“影子国家”。^① 无论是“国家俘获”还是“影子国家”，都是少数利益集团通过对国家机构施加不正当影响而造成大规模贪腐现象。另外，苏丹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因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而被总部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通缉，苏丹过渡政府也曾表示同意将巴希尔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判。有评论认为，尽管对前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任期间的罪行加以追责尚不普遍，但一系列前领导人和高级官员获罪显示出非洲国家司法独立性逐渐提高。^② 当然，这一过程仍然缓慢，而且可能遭遇诸多挫折。例如，祖马被判入狱后，他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由此引发大规模暴乱，导致 276 人死亡。这起事件被认为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的“至暗时刻”，尽管不少暴乱者更多是不满于新冠肺炎疫情加剧造成的经济不平等。^③

传统治理模式回归

总体而言，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精英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及政治文化理论等却难以很好地解释其根源。^④ 西方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洲政治发展出现“倒退”甚至“衰退”，对所谓非洲“第二次独立”或“虚拟奇迹”的乐观情绪明显减弱。^⑤

① Nic Cheeseman, “Introduction: The Shadow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Democracy in Africa (ed.), *The Shadow State in Africa: DRC, Uganda, Zambia, Zimbabwe*, London: Democracy in Africa, 2021, pp. 9–43.

② Munashe O’brian Gutu, “Incarcerations of Former African Leaders: Political Vendetta or Judicial Improvement?” *African Exponent*, October 17, 2021, <https://www.africanexponent.com/post/17398-incarcerations-of-former-african-leaders-political-vendetta-or-judicial-improvement> [2022-04-20].

③ Jennyfer Jimenez, “Civil Unrest in South Africa: The Imprisonment of Jacob Zuma Sparks Protests,” in Wilson Center (ed.), *Africa: Year in Review 2021*, Washington, D. C.: Wilson Center, January 18, 2022, p. 23.

④ Jeffrey Herbst,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 Africa after Ten Year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3, No. 3, 2001, p. 358.

⑤ Richard Joseph, “Africa: The Rebirth of Political Freedo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 No. 4, 1991, pp. 11–24.

对非洲政治发展的认知赤字，基本上与西方对非洲根深蒂固的偏见及对非洲传统治理智慧的忽视甚至贬抑有关。出于对西式民主在非洲水土不服的反思，非洲国家积极探索稳定且有效地结合现代与传统治理模式，探索非洲自主发展模式，而这必然伴随着种种风险乃至失误，就被西方简单地等同于“政治倒退”。

（一）传统治理模式的民主要素

在漫长的历史中，非洲曾存在大量有利于民主且符合非洲国情的政治实践。非洲传统社会内部存在着民主制，即所谓“大树下的民主”。这种原始民主制一直延续至今，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遵从长者，二是协商一致。^① 遵从长者即遵从权威，协商一致即尊重民主，二者相结合有利于维护传统部落社会的正常运转。在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社会中，无论是无国家意识的分散型社会，还是威权主义的军事帝国（如桑海帝国），基于酋长制等传统血缘纽带形成的制度化仪式权力，促使统治者重视被统治者的需求和利益。这意味着，尽管没有完善的民主形式，但是非洲国家并不缺乏民主精神。前殖民时期存在的一些非洲王国，往往存在如下共同特征：几乎所有类型的国家都关心公民福利；社会是以宗族为基础但出于政治目的而组织的；^② 尽管明显存在不平等，但是享有特权的阶层必须确保国家创造的利益得到广泛分享，因为平民也拥有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③ 非洲传统威权统治也为有效的政治反对留下了空间。^④ 这样，在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公开辩论和协商民主成为政治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强调的是，非洲传统治理模式高度复杂，其民主要素的发掘和现代化远非学术分析那么简单。事实上，正是由于其现代化不充分，传统治理模式才成为西方贬抑非洲政治发展的对象。历史地看，殖民者将选举和代议制引入非洲，其目的并非促进当地民主政治发展，而是维护殖民统治利益。^⑤ 尤其严重的是，西式民主中的“赢者通吃”原则，根本性地破坏了非洲传统治理中的平等主义与协商

① 徐济明：《非洲传统文化与政治现代化》，《西亚非洲》1996年第1期，第31页。

② Jan Vansina, *Beyond Chiefdoms: Pathways to Complexity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 - 15; Jan Vansina, *How Societies are Born*, Charlott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5, p. 114.

③ Robert H. Bates,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42.

④ Adrienne LeBas, *From Protest to Parties: Party - Build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46.

⑤ Crawford Young, *The African Colonial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精神，进而制造出一种“撕裂”效应，导致非洲国家引入西式民主后出现社会分裂乃至选举暴力。现实地看，正是由于西式民主对非洲传统治理智慧的贬抑，冷战结束后仍有大量民主研究者预言，识字率低、公民文化落后、经济落后等结构性条件缺失，导致非洲不会实现民主化。^① 但如前所述，如果以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水平的关联度进行衡量，非洲应得的评价要远高于现有的实际评价。

（二）传统领袖的治理角色

正是由于非洲传统治理智慧遭到贬抑，而西式民主又有强烈的“撕裂”效应，非洲民众日益认识到西式民主的缺陷，并重新审视传统酋长制的优势。一方面，非洲民众认识到西式民主的内在缺陷，即未必能选出优秀的、负责的领导人。根据非洲晴雨表调查，2005—2018年非洲民众对选举政治的支持度略有下降，从82%降到74%；同期支持以其他方式遴选领导人的比例从16%增至24%（图3）。这一趋势在国家层面表现得更为明显，2011—2020年非洲晴雨表调查的15个国家中，仅塞拉利昂对选举政治的支持度呈上升态势，几内亚保持不变，其余13个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莱索托、突尼斯和马拉维三国降幅较大，其中莱索托降幅达23%（图4）。这充分说明，非洲民众对西式选举政治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和趋于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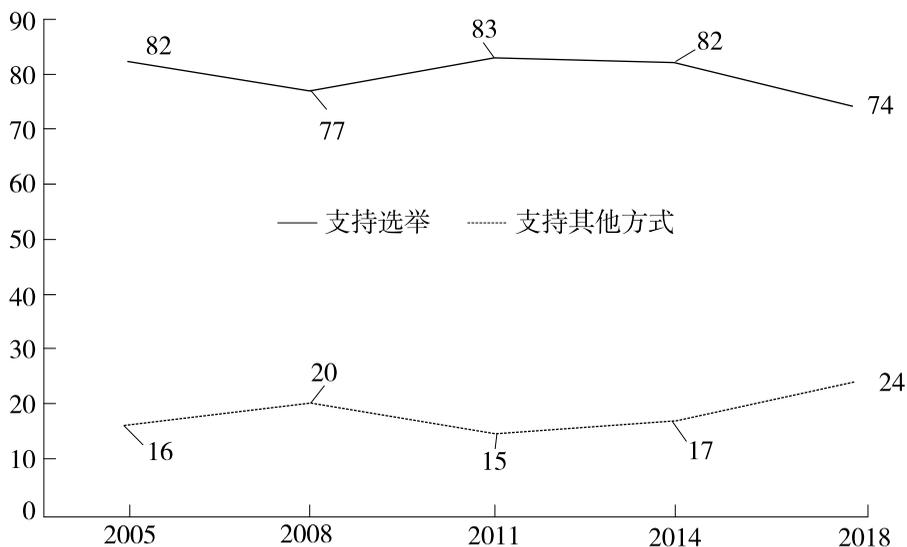


图3 非洲公众对选举政治的支持度变化（%），2005—2018年

资料来源：Michael Bratton and Sadhiska Bhoojedhur, “Africans Want Open Elections—Especially if They Bring Change,” p. 7.

^① Richard Joseph,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after 1989: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9, No. 3, 1997, p. 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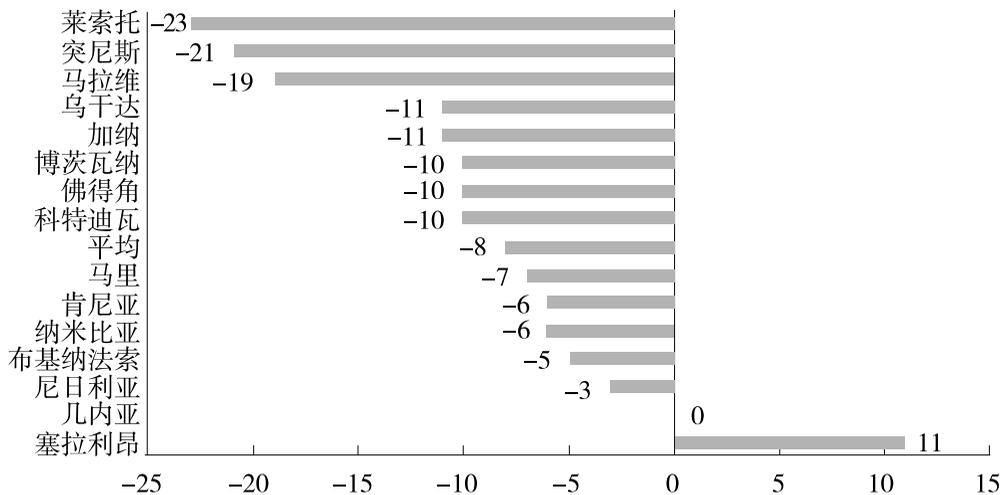


图 4 非洲 15 国对选举政治支持度的变化 (%)，2011—2020 年

资料来源：Fredline M’ Cormack – Hale and Mavis Zupork Dome, “Support for Elections Weakens among Africans; Many See Them as Ineffective in Holding Leaders Accountable,” p. 8.

另一方面，非洲民众对传统领袖的认知更为客观。非洲传统领袖往往被西方舆论建构为不合时宜乃至可能强化“庇护政治”，因而是“反民主”的。^①但在非洲民众看来，传统领袖对本国政治发展有积极意义。^②根据非洲晴雨表调查，在许多非洲国家，传统领袖的地位仍然牢固，甚至有强化趋势。与民选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相比，传统领袖在公众信任度、工作表现、聆听公众声音、清廉度等方面有可能得分更高。2019—2021 年，在 22 个非洲国家的民意调查中，传统领袖在上述 4 个方面获得的民众支持度分别为 64%、64%、44% 和 72%，均比其他类型的权威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图 5）。在 2008/2009 年以来的 4 轮调查中，非洲民众对传统领袖信任度的波动幅度仅 4 个百分点，2021 年仅比 2009 年降低 1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非洲民众对总统的信任度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对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的信任度都下降了 9 个百分点。换句话说，2008/2009 年以来，在非洲晴雨表持续跟踪的 14 个国家中，非洲民众对传统领袖的信任度保持稳定，而对民选领导人的信任度大幅下降，进而导致传统领袖与政府领导人之间受信任度的差距持续扩大。^③

① See Alexander Beresford, “Power, Patronage, and Gatekeeper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 114, No. 455, 2015, pp. 226 – 248; Bruce J. Berman, “Ethnicity, Patronage and the African State: The Politics of Uncivil Nationalism,” *African Affairs*, Vol. 97, No. 388, 1998, pp. 305 – 341.

② Donald I. Ray et al., “Introduction: The New Relevance of Traditional Authorit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Vols. 37 – 38, p. 7.

③ Carolyn Logan and Luyando Mutale Katenda, “African Citizens’ Message to Traditional Leaders: Stay in Development, Stay Out of Politics,” pp. 3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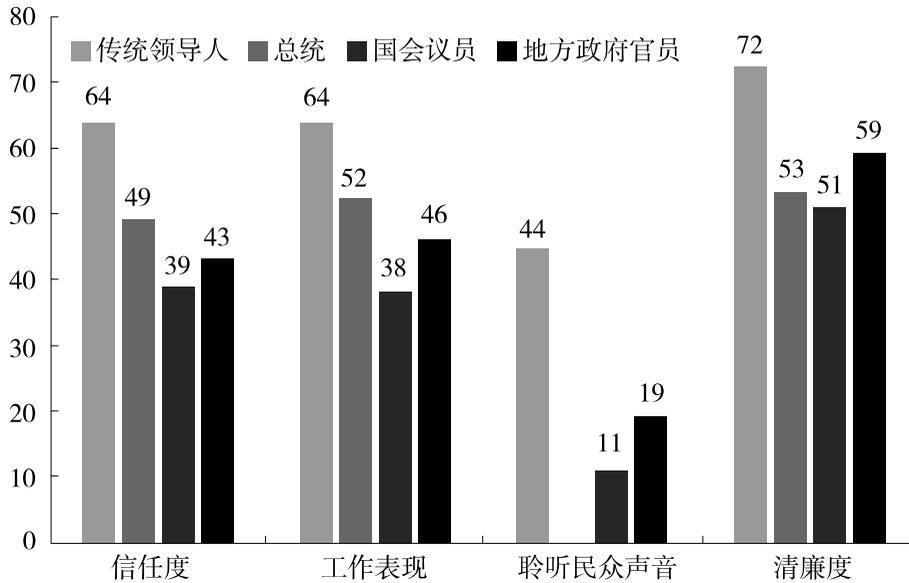


图5 非洲民众对传统领导人的认可度（%），2019—2021年

资料来源：Carolyn Logan and Luyando Mutale Katenda, “African Citizens’ Message to Traditional Leaders: Stay in Development, Stay Out of Politics,” p. 3.

与此同时，尽管对传统领袖的治理角色持积极态度，非洲民众只是将这种积极角色限定在冲突解决、社区治理、土地分配等传统功能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传统领袖介入选举政治（图6）。很显然，非洲民众认识到，非洲传统治理智慧也有其局限性，如果传统领袖过度介入选举政治，可能导致非洲选举政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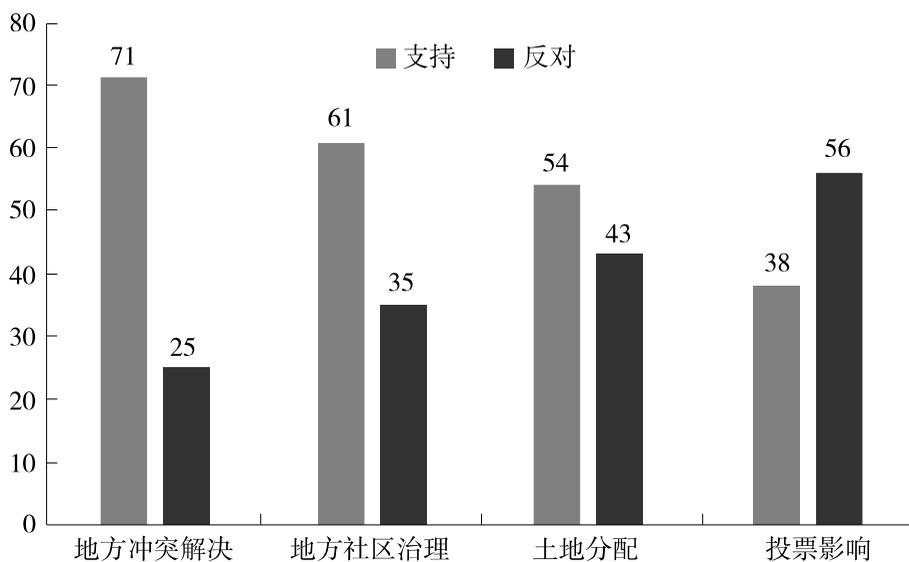


图6 非洲民众对传统领导人角色的认知（%），2019—2021年

资料来源：Carolyn Logan and Luyando Mutale Katenda, “African Citizens’ Message to Traditional Leaders: Stay in Development, Stay Out of Politics,” p. 6.

政党政治部落化，而这恰是过去几十年困扰非洲民主政治的重大难题。^①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西方所认为的当前非洲“政治倒退”的重要表现。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非洲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化改造仍然不够充分。

（三）探索现代与传统治理模式相结合

自独立以来，非洲国家的政治治理总体上经历了 4 个阶段，即独立之初的继承式治理，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本土化治理，冷战后的西式民主化治理，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的自主化治理。^②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有尝试，非洲国家结合现代与传统治理模式的探索远未终结，仍然处于模式尚不稳定、各类风险多发高发的阶段。经济发展困难、社会问题积累，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使非洲国家的政治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非洲各国普遍面临复杂的民族、宗教和党争等问题，影响甚至危及国家稳定和团结。其次，近年来非洲国家虽然保持经济增长，但是分配机制未及时跟进，“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民生改善缓慢，导致许多民怨和社会问题。再次，新冠肺炎疫情给非洲国家带来严重冲击，疫情管控造成民生更加困难，疫情后经济恢复难度很大。在此背景下，西方倡导的“善治”远不如结果导向的“有效治理”。为追求治理实效，不少非洲国家开始反思西式民主的不足，并试图结合本国传统与实际情况，探索现代与传统治理模式相结合。西式民主本地化与传统模式现代化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过程，但是在西式民主水土不服的情况下，传统模式现代化就显得更为重要。需要说明的是，非洲既有努力尚未建构出稳定且有效的结合模式，使传统模式的不合理方面被明显放大，主要体现为长期执政和军事政变风险。

一方面，治理稳定性被简化为执政稳定性。非洲面临多重治理危机，导致对治理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呼吁持续增强。由于西式民主强调的周期性、短期性选举难以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对非洲传统的长期执政模式加以改造并利用便成为一个选项。尽管潜在的改造方案可能不止一种，非洲国家主要采取延长现任领导人执政任期的方法。2000—2020 年非洲国家共计 54 次延长现任领导人执政任期，其中 49 次得到议会批准。在 2021 年顺利举行的 11 场总统选举中，也有超过一半

① Katharina Holzinger, Florian G. Kern, and Daniela Kromrey, “The Dualism of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State: Institutional Setup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9, No. 3, 2016, pp. 469 – 481.

② 张春：《非洲政治治理 60 年：多重长期困境与潜在创新出路》，《西亚非洲》2020 年第 2 期，第 66—90 页。

的国家追求执政稳定性。^① 对于非洲国家追求执政稳定性的努力，西方国家以自身标准认为是“民主倒退”的表现。例如，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IDEA）认为，1985年非洲只有3个民主国家；2015年非洲民主国家数量达22个，创下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2020年非洲民主国家数量则回落至18个，以此表明非洲处于“民主倒退”。^②

另一方面，治理有效性被简化为执政有效性。发生危机往往对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冲击，因此要求政府在最短时间内扭转局势，这意味着治理有效性必须得到明显提升。一旦治理有效性没有得到及时改善，民众乃至精英可能对现政府产生不满，甚至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军事政变就是其中的极端情况。根据全球军事政变数据库统计，1950—2021年非洲共计发生217起政变，其中100起政变成功。按时间段来看，冷战结束后非洲政变数量和频率都明显降低。1950—1991年非洲共计发生139次政变，其中成功67次，成功率为48.2%；1992—2021年非洲共计发生政变78次，其中成功33次，成功率为42.3%，比冷战时期降低了6个百分点。^③ 但是，近年来非洲军事政变回潮的态势较为明显，引发世界关注。2019—2021年，非洲共发生政变9次，其中成功6次，呈现出显著的反弹态势。仅在2021年，非洲就发生5次政变，有3次成功。马里和苏丹均在短期内连续发生政变，国家局势严重不稳，而且危及地区稳定。

在很大程度上，军事政变是将治理有效性等同于执政有效性。例如，绝大多数政变都指责现政府腐败、渎职或背信弃义。2021年9月，几内亚发生政变，在任总统阿尔法·孔戴（Alpha Condé）被扣押，一个重要原因是孔戴试图谋求连任，引发抗议活动和政变。马里和苏丹发生政变的理由较为相似，即将国家从文官政府的“治理衰败”中拯救出来。^④

混淆治理有效性和执政有效性，会导致对政变的界定困难。2021年4月，

① Michar Wiebusch and Christina Murray, “Presidential Term Limits and the African Union,” *Journal of African Law*, Vol. 63, S1, 2019, pp. 131 – 160; Joseph Siegle and Candace Cook, “Circumvention of Term Limits Weakens Governance in Africa,”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y 17, 2021,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circumvention-of-term-limits-weakens-governance-in-africa/> [2022-05-12].

② International IDEA, *The State of Democracy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2021: Resilient Democratic Aspir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nsolidation*,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DEA, 2021, p. 1.

③ 笔者根据军事政变数据库资料计算得出，<https://militarycoups.org/> [2022-05-20].

④ Sean M. Zeigler, “Are Military Coups Back in Style in Africa?” *Political Violence At A Glance*, December 1, 2021, <https://politicalviolenceataglance.org/2021/12/01/are-military-coups-back-in-style-in-africa/> [2022-04-15].

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 (Idriss Deby) 在前线督战时受伤不治身亡后, 该国并未依据宪法由国会议长接任总统并完成剩余任期, 而是由军队接管, 并成立以代比之子穆罕默德·伊德里斯·代比 (Mahamat Idriss Deby) 为首的军事过渡委员会, 进入为期 18 个月的过渡期。2022 年 10 月, 过渡政府将过渡期延长, 穆罕默德任过渡总统。此举引发重大争议, 不少非洲国家要求非盟将这种行为认定为政变并加以制裁, 但是非盟在调查后认可了乍得的过渡安排。^① 非盟对乍得政府变更的认可, 却为随后界定苏丹政变带来困难, 引发有关非盟采取“双重标准”的猜测。^②

大众政治的觉醒与脆弱

无论是政治现代化的演进, 还是传统模式的回归与改造, 其本质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努力。如果不考察广大民众的参与, 关于非洲政治发展的分析便不完整。事实上, 非洲政治发展的各种不足已成为自下而上推动政治治理的重要因素。进入 21 世纪以来, 通过塑造公众舆论、大规模示威抗议等举措, 非洲民众正在自下而上地推动非洲政治治理改善。也应看到的是, 政治激情在这个过程中相当重要, 但也存在被西方国家利用的可能性。

(一) 民主政治共识日益巩固

尽管民众高度支持民主政治, 但其民主需求与制度性的民主供应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根据 2016—2018 年非洲晴雨表对 34 个国家的调查, 高达 68% 的受访者将民主视为首选制度, 只有 13% 认为非民主政治更好。^③ 例如, 加纳与塞拉利昂的反对党分别在 2016 年和 2018 年大选中击败执政党, 两国分别有 70% 和 65% 的受访者认为, 民主政治有助于罢免执政能力不佳的领导人。而在乌干达, 约韦里·穆塞韦尼 (Yoweri Museveni) 自 1986 年以来持续执政, 民众对本国政

① Paul - Simon Handy and Felicite Djilo, "The African Union's Peace and Security Dilemma," *ISS Today*, July 26, 2021, <https://issafrica.org/iss-today/the-african-unions-peace-and-security-dilemma>[2022-04-15]; Paul - Simon Handy and Felicite Djilo, "AU Balancing Act on Chad's Coup Sets a Disturbing Precedent," *ISS Today*, June 2, 2021, <https://issafrica.org/iss-today/au-balancing-act-on-chads-coup-sets-a-disturbing-precedent>[2022-04-15].

② Aggrey Mutambo, "Arab States 'Interests Fuelling Generals' Thirst for Power in Khartoum," *The East African*, October 31, 2021, <https://www.theeastafrican.co.ke/tea/rest-of-africa/arab-interests-fuelling-generals-thirst-for-power-in-khartoum-3602006>[2022-05-05].

③ Robert Mattes, "Democracy in Africa: Demand, Supply, and the 'Dissatisfied Democrat'," *Afrobarometer Policy Paper*, No. 54, 2019, pp. 2 - 3.

府及选举政治的认可度仍然较高。^①可以说，在非洲民主政治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势不可挡。

因此，非洲政治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缺乏民主政治共识，而是民主供应与民主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对本国的民主供应状况仍然感到不满，只有43%的民众对本国的民主供应及运作方式感到满意，34%的民众认为本国的民主供应较为充分。^②根据非洲晴雨表的连续性调查，民众对非洲各国民主供应水平的认知整体稳定，仅2011年前后达到所有调查中的最高水平，2018年与2005年大体相当。但是广大民众的民主需求水平明显提升，从2005年的39%增至2018年的44%，民主需求水平的最高纪录也出现在民主供应水平最高的2011年。这意味着，非洲民主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但最大差距出现在2011年和2014年，到2018年反而有所缩小（图7）。正是由于民主供需缺口的持续存在甚至逐渐拉大，非洲民众对选举政治的支持度有所下降，而适度的本土化回归可能会增强民众对本国民主状况的满意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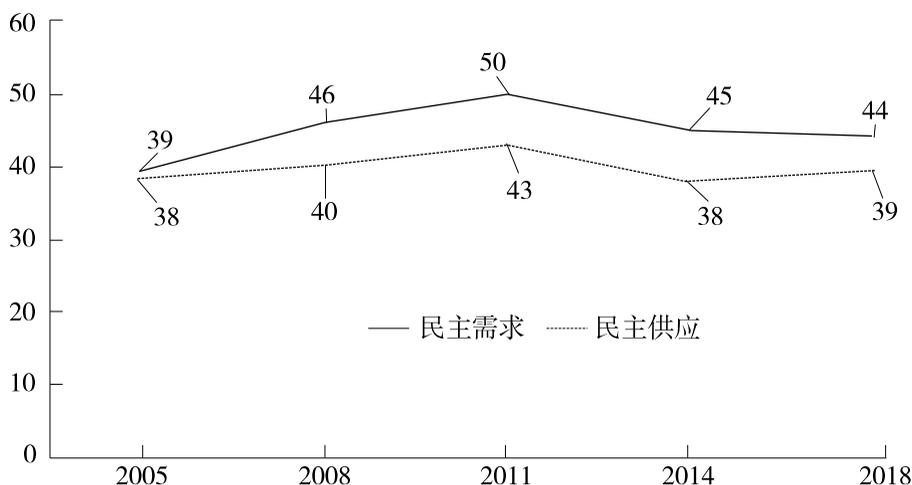


图7 非洲民主供需关系的变化（%），2005—2018年

资料来源：Robert Mattes, “Democracy in Africa: Demand, Supply, and the ‘Dissatisfied Democrat’,” p. 16.

① Fredline M’Cormack – Hale and Mavis Zupork Dome, “Support for Elections Weakens among Africans; Many See Them as Ineffective in Holding Leaders Accountable,” p. 2.

② Robert Mattes, “Democracy in Africa: Demand, Supply, and the ‘Dissatisfied Democrat’,” pp. 2 – 3.

(二) 草根抗议政治持续增长

由于民主共识较高与民主供需失衡两种状况并存，为争取更大民主，民众倾向于采取示威抗议的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非洲国家政治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这表明尽管“第三波民主化”和“阿拉伯之春”曾导致一些国家的治理模式发生变化，但远未达到实质性推动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步。在此背景下，以青年人为主的非洲民众再次走上街头，推动基于社会正义、包容性参与和公平发展的政治治理。^①

以 2021 年为例，在北非地区，针对政府疫情防控不利、腐败以及国家经济危机，突尼斯民众的抗议活动自年初就已开始，在总统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后抗议活动达到高潮，直至 2022 年 1 月还有数百名抗议者试图到突尼斯市市中心进行抗议。^② 在西非地区，马里、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和加纳也都出现过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中，马里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该国民众呼吁政府加强同俄罗斯的安全合作，并要求法国军队撤出。^③ 在马里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西非经济共同体宣布支持对马里实施严厉的新制裁，马里军政府对此呼吁进行全国范围的示威活动。^④ 在中非地区，喀麦隆、乍得和刚果（金）也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民众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国家领导人及社会热点问题的不满和诉求。^⑤

从历史趋势看，非洲民众抗议活动大幅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非洲民主政治发展紧密相关。根据“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Project, ACLED）统计，2000—2010 年非洲各国民众抗议活动保持较低水平，年均 600 余起，年均增长率 11.3%。而“阿拉伯之春”对非洲民

① Cyril Obi, “Pro - Democracy Protests: Generation Next at the Barricades in Africa,” in Wilson Center (ed.), *Africa: Year in Review 2021*, Washington, D. C. : Wilson Center, January 18, 2022, p. 22.

② “Tunisia Police Use Water Canon on Protesters,” *Alarabiya News*, January 14, 2022,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coronavirus/2022/01/14/Tunisia-police-fill-city-center-ahead-of-protest-in-defiance-of-COVID-19-rules> [2022 - 04 - 20].

③ “Mali: Protesters Call for French Troops to Leave, Some Call for Greater Russia Cooperation,” *Africa News*, July 26, 2021, <https://www.africanews.com/2021/06/26/mali-protesters-call-for-french-troops-to-leave-some-call-for-greater-russia-cooperation/> [2022 - 04 - 20].

④ “Mali Govt Urges Protests Against ‘Extreme’ Sanctions,” *Eyewitness News*, January 11, 2022, <https://ewn.co.za/2022/01/11/mali-govt-urges-protests-against-extreme-sanctions> [2022 - 04 - 23].

⑤ “2021 Review: Major Protests that Hit Africa This Year,” *Africa News*, December 31, 2021, <https://www.africanews.com/2021/12/31/2021-review-major-protests-that-hit-africa-this-year/> [2022 - 04 - 23].

众抗议活动的增长有显著影响，2011—2018 年间平均达到 4500 余起，相当于 2000—2010 年间的 7 倍多，年均增长率也达到 26%。2019 年非洲各国的抗议活动大幅增长，相当于 2018 年的 4 倍。平均而言，2019—2021 年非洲各国民众抗议活动达到 1.5 万余起，年均增长率达到 130%（图 8）。回顾 2000 年以来非洲民主政治发展，可以看出非洲民众抗议活动事实上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步：随着非洲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非洲民众的民主需求以及通过抗议争取更大民主的积极性也在持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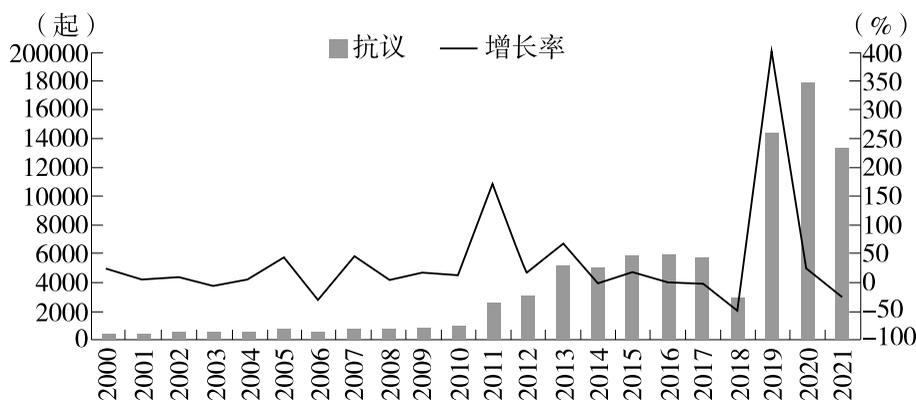


图 8 非洲民众抗议活动，2000—2021 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ACLED 数据库资料制作，<https://acleddata.com>。

由于其政治追求符合民众预期，非洲发生的许多抗议活动甚至成为网络标签，例如刚果（金）“#Congoisbleeding”、尼日利亚“#Endsars”、南非“#Aminext”和“#StopsGV”等，这些抗议活动背后是非洲民众对政治治理的更高追求。例如，根据非洲晴雨表的连续性调查，在 30 个非洲国家中，支持民主和反对专制的人数都在持续增长。2018 年，78% 的民众反对独裁，72% 的民众反对军人掌权；2021 年，反对独裁的民众比例增至 82%，反对军人掌权者也增至 75%。^①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 年非洲民众抗议活动明显增长，但在 2021 年大幅下降，这也许暗示了大众政治觉醒带来理性政治发展。2021 年非洲大陆共计发生 1.33 万起示威抗议活动，尽管数量相对较大，但比 2020 年下降了 25.5%，甚至比 2019 年还要低约 8 个百分点。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下降是在疫情长期持续、经济日益困难、安全持续动荡的背景下发生的。更重要的是，这是自 ACLED 从 1997 年记录非洲示威抗议活动以来，仅有的 7 个下降年份之一，其降幅高居第

① E. Gyimah - Boadi and Joseph Asunka, “Do Africans Want Democracy—And Do They Think They’re Getting It?” *Afrobarometer Blogs*, November 2, 2021, <https://afrobarometer.org/blogs/do-africans-want-democracy-and-do-they-think-theyre-getting-it> [2022-05-10].

三位。^① 在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疫情导致的社交管控，但非洲民众对民主政治追求更加理性或许也是重要原因。

（三）非洲大众政治被西方扭曲

由于民众与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非洲大众政治的觉醒极易被西方国家利用，成为它们反对非洲的重要工具。之所以强调“被利用”，是因为西方国家高度强调民众的民主参与，但从未真正指望甚至从来就不希望大众力量推动非洲政治发展。西方的真正目的，更多是通过鼓动大众政治激情，从而在特定国家发动诸如“颜色革命”这样自下而上的反政府活动，破坏非洲国家的长治久安。例如，美国声称，2002—2012 年其对非洲国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增长了 400%。^② 尽管如此，另一份报告显示，西方对非洲国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力度有限。据统计，2010—2019 年总部在非洲之外的国际慈善机构对非洲捐助中，非政府组织仅获得 14%，公共部门获得 20%，其他国际组织获得 58%。^③

无论资助力度如何，西方国家一直高度关注政治因素，在所有为非洲国家非政府组织提供经费的机构中，聚焦人权的高达 42%，中小学教育为 30%，高等教育为 26%，政府治理为 21%，显然经济、民生等议题并未成为西方的关注重点。^④ 在西方的干扰下，非洲民众对政治发展道路自下而上的探索未能与政府或精英阶层自上而下的探索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合力，所取得的成效有限。

结 语

如果说“第三波民主浪潮”是冷战结束后主导非洲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近年来非洲政治发展则是三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政治现代化进程，二是回归传统以提升治理稳定性和有效性，三是自下而上的大众政治治

① 笔者根据 ACLED 数据库资料计算得出，<https://acleddata.com/>[2022-05-10]。

② Steven Lawrence, Anna Koob, and Niamani Mutima, *U. S. Foundation Funding for Africa 2015*, Washington, D. C. : Foundation Center, 2015, p. 4.

③ Mosun Layode, et. al., “Disparities in Funding for African NGOs,” African Philanthropy Forum, July 2021, pp. 10 - 12, <https://africanpf.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disparities-in-funding-for-african-ngos-report.pdf>[2022-03-18]。

④ Steven Lawrence, *The Africa Funding Landscape: A Profile of Funders Focused on Africa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Field*, Washington, D. C. : Africa Grantmaker's Affinity Group (AGAG), 2019, p. 10.

理。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对非洲正经历“第三次民主衰退浪潮”的判断，事实上刻意夸大了现代与传统治理模式结合过程中的风险，同时刻意忽视了非洲政治发展的积极方面。

衡量非洲政治发展的三股力量，可以认为经济、社会、治理等困难正推动非洲政治进入新的转型期。一方面，巩固民主政治、探索自主模式及促进草根政治等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非洲政治道路的前进方向更加明确。另一方面，随着非洲大陆新一轮选举季的启动，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等地区大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不够明确，而埃及、埃塞俄比亚、苏丹、刚果（金）、利比亚等国局势远未稳定，短期内非洲政治发展可能呈“群龙无首”的态势。^①如果地区大国保持政治稳定，长期发展态势仍值得期待。两相结合，非洲政治发展可能正迈向新的阶段，但其核心显然不是“善治”，而是“有效治理”。非洲迈向有效治理的关键或许在于，通过政治现代化、本土传统和大众政治的有机结合，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三者优势，并尽力避免三者风险，塑造出适合非洲特点的政治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贺杨 责任校对：陈雅慧）

① “Africa in 2022: The Danger of Hegemonic Instability,” *The Africa Report*, January 19, 2022,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168249/africa-in-2022-the-danger-of-hegemonic-instability/> [2022-05-25].

referring to 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diplomatic strategies. Africa is a major region in China's foreign medical assist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 – 19 pandemic,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medical assistance to Afric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providing and receiving assistance by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relational perspective. It builds the interaction model of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 practice, relationship selection and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 and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of China's medical assistance to Africa by making relevant assumptions.

Keywords: China – Africa relationship, relational perspective, medical assistance, public health products, a global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all

Authors: Weng Lingfei, Research Fellow a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00); Meng Feidan, Master's Candidate a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00).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ls in African Countries

Zhang Chun and Qu Shiyi

Abstract: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s a stag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for a country and a natural element of political advancement of human society. It is not unique to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ll countries and nations must undergo a transition from underdevelopment to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political systems. After gaining independence, although African countries have faced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especially the threat of interference from western countrie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ffairs, they have actively explored their ow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s and strived to move towar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s the COVID – 19 epidemic wreaking havoc across the glob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has hit major roadblocks, revealing deficiencies in political governance. Against this backdrop, African countries need to further explo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s, accelerat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mprove their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well – being of African people. Currently, there are mainly three manifestation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Africa: the strengthening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with western – style democracy as a reference, the return of local traditional models, and the awakening of public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long – term,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odernization, local traditions, and public supervision may be the key to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Africa.

Keywords: African politic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democratic politics, public politics, political governance

Authors: Zhang Chun, Research Fellow at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Qu Shiyi, Master’ s Candidate at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Neoliberalism and Ethiopia’ s Exploration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ath

Yun Wei, Pan Liang and Zhai Fengjie

Abstract: Since the regime change in Ethiopia in the early 1990s, neoliberalism has taken root in the political and socio – economic landscape of Ethiopia and has been growing with far – reaching effects on the country’ s political proc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neoliberalism in Ethiopia as well 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ehind i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nline news analysis and sample survey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oliberalism in Ethiopi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rise, decline and its current reemergence, and believes that western factor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this proces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although different Ethiopian governments have, to varying degrees, adopted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neoliberalism has never become the core ideology of the Ethiopian government. In fact, the Ethiopian government has never stopped exploring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ath.

Keywords: Ethiopia, Neoliberalism,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ath,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Authors: Yun We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Center for African Union Studi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 Pan Lia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Center for African Union Studi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 Zhai Fengjie, Professor at Center for African Union Studi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